

上海跨世紀經濟發展戰略

——「一個龍頭、三個中心」——

宋國誠

（本中心副研究員）

摘要

自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正式向西方世界開埠以來，上海經濟的發展以及它在中國乃至遠東、整個世界的經濟地位，幾經沉浮。現在中共立下「宏大目標」，到本世紀末、下世紀初將上海建設成爲「一個龍頭、三個中心」的現代化城市。所謂「一個龍頭」，是指將上海建設成爲長江三角洲、長江流域，乃至整個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龍頭；所謂「三個中心」，是指將上海發展爲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三個中心大城市。本文作爲上海區域發展系列專文之一，首先依據對上海經濟發展的長期觀察，就這一戰略目標的有利條件和制約因素，以及與鄰近國家的相對比較作一通盤分析。可以看出，上海跨世紀發展藍圖，雖是好夢，但恐好夢難圓。

一、宏大目標

一九九四年上海組織近百個單位，六〇〇餘名專家、學者，就上海未來二十年的經濟發展目標進行研究。經過一年多的

努力，以「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上海」為名，近百萬字的系列課題報告問世。由於這些課題報告完全是根據鄧小平和中共其他領導人關於上海發展的有關講話精神寫成的，報告一出爐立即得到中共高層的支持。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召開了由大陸著名專家、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及上海市各級政府領導人，參加了「上海跨世紀發展戰略研討會」，並對課題報告進行評審。接著，又召開國際研討會，邀請國際著名專家、學者，就這些報告展開討論。至此，一張嶄新的上海未來發展藍圖，已大致構想完成。

按照這張藍圖，到二〇一〇年，上海基本建設成為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浦東基本建設成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現代化的新區，實現使上海成為一新興國際經濟中心的戰略目標。這些規劃的目標包括：

- ① 基本形成世界大都市的經濟規模和綜合實力。
 - ② 基本形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現代化城市格局。
 - ③ 基本形成大陸國內外廣泛經濟聯繫的全方位開放格局，成為全球經濟網絡中的重要空間節點。
 - ④ 基本形成符合國際慣例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發揮上海市場配置國內外資源的中心作用。
 - ⑤ 基本形成現代化國際城市基礎設施的構架。
 - ⑥ 基本形成社會發展協調、生態環境優化的城市生活體系。
- 按照這張藍圖，上海將重塑反應時代特徵、「中國特色」，和上海特點的城市功能。具體言之，上海將成為大陸內外資金、商品、技術、人才和信息交流的中心之一，發揮商品和信息要素集散功能；繼續利用原有的工業優勢，從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高，發揮高新技術產品開發和生產功能；上海將成為大陸內外大公司、大集團的總部匯集地，發揮經濟中樞的管理功能；並著力於為大陸內外各類要素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提供服務、發揮在世界經濟生活中的服務功能。也就是說，上海將成為具有「中國特色」、上海特點的新的城市管理制度和企業制度的發祥地，發揮「特大城市」的創新功能。

上述的藍圖為依據，上海將落實以下四項功能目標：

- ① 以集散功能為先導，推動上海儘快成為國際的金融、貿易中心。
 - ② 以生產、管理功能為基礎，促進上海實現超越發展、增強綜合實力。
 - ③ 以服務功能為條件，保證城市內外溝通和有效運轉。
 - ④ 以創新功能為動力，增強城市的生機和活力。
- 為實現以上四項功能目標，大陸當局還擬定以下四個推進戰略：
- ① 在產業結構調整中實施優化、擴散與創新相結合的轉移戰略。

①在經濟合作中實施沿海、沿江共同發展的聯合戰略。

②在參與世界競爭中實施對內外全方位開放的接軌戰略。

③在經濟建設中實施高起點、跨躍式發展戰略④。

滄海桑田，紀元晉遷，歷史將要邁入二十一世紀。大陸當局在此世紀之交的關鍵時刻，花了九年之力，描繪出上海未來發展藍圖，既有其重大的經濟帶動作用，也有重大的政治示範作用。目前，大陸的統治權落在以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幫」手中。上海的未來的發展，將直接影響他們的政治命運和前途。上海的興衰，對江澤民領導集團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問題在於這張藍圖具有多少現實的可能性？究竟是一般的政治鼓動或天方夜譚式的夢想？還是足以使上海脫胎換骨的具體計劃？有待深入的分析與觀察。

一一、有利條件

中共提出到本世紀末、下世紀初，將上海建設成爲「一個龍頭、三個中心」即現代國際大都市，並非完全空穴來風，而是有一定依據的。這可以從「歷史的上海」和「八〇年代及九〇年代初上海的發展」兩個方面來加以說明：

其一，歷史的上海：具備了成爲國際化大都市的條件。

上海位於長江入海口，背倚物富人豐的長江三角洲，地處大陸東部海岸線中點，即「黃金水道」和「黃金海岸」的交匯點，面對太平洋及東南亞國家和地區。自古以來，上海得益於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從一個鄉村漁港崛起、發展並逐步走向繁榮，成爲具有地理、人文、科技、信息等綜合優勢，擁有六三四一平方公里，一三〇〇萬人口的特大城市，成爲中國大陸最大的經濟中心。

上海是大陸重要的工業基地，有較好的工業基礎和協作配套條件，有較強的吸收先進技術的能力。上海是大陸的交通樞紐，水陸交通發達，上海港與四〇〇多個港口相銜接，鐵路幹線連接全大陸，機場相接世界各地主要城市，郵電通訊直達國際、國內八百多個城市。從某個意義上說來，上海是一扇洞悉世界的窗口，又是輻射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重要樞紐。上海在大陸對外開放的戰略格局中，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另外，上海是大陸重要的科技、教育、文化中心，上海人勤勞、智慧、

① 蔡來興，邁向現代化的選擇——九十年代上海經濟發展大思路（上海：遠東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一二五；金兌，「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中國、上海」，上海經濟（上海），一九九五年第一期，頁二七—二八；上海統計局，「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上海——中國投資的新特點」，中國國情與國力（北京），一九九四年第四期，頁二三—二四。

精明。上海具備成爲國際化大都市的基本條件。

其二，八〇年代及九〇年代初的發展：奠定了上海邁向新世紀的一定基礎。

八〇年代及九〇年代初是上海發展的一個重大歷史轉折時期。這十多年，上海借助於自身的實力、承受力和應變能力，努力克服了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的各種困難，獲得了較大的發展。

首先，經濟綜合實力顯著增強。改革開放使上海的國民經濟進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一九九三年上海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五一〇億元，占整個大陸的百分之四·八，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一九七八年增長二·四倍，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八·四。全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由一九七八年的二四九八元提高到一九九三年的一一六八六元。實現財政收入四三九·五三億元，占整個大陸的百分之二〇②。一九九四年上海國民生產總值又攀新高，達到一九六六·六五億元，比一九九三年增長百分之十四·三③。一九九五年一至二月上海國民生產總值又比一九九四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二·六，達到六六九·四四億元④。

其次，投資環境不斷改善。自八〇年代以來特別是九〇年代，上海集聚了大量建設資金，投入城市道路、電力、郵電通信、市政公用、園林綠化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三年間，用於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就達三一〇億元，平均每年以百分之四四·六的高速增長。先後完成上海鐵路新客站、虹橋國際機場擴建、延安東路過江隧道、黃浦江上游引水工程、瀘嘉、莘松高速公路、南浦大橋、浦東煤氣廠、吳淞路閘橋、外灘交通綜合改造一期工程等一大批城市基礎設施重大項目。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四年，上海城市建设更是突飛猛進，楊浦大橋、地鐵一號線、吳淞大橋、江蘇路拓寬工程、外灘交通綜合改造二期工程、內環線高架路、合流污水治理一期主體工程、外高橋港區工程、人民廣場改造工程等一大批重大市政建設項目相繼建成竣工。今年，成都路高架路即南北高架路又可望竣工。今天的上海，立體交通網路建設已見端倪，城市環境正逐步改善。

第三，浦東開發與外向型經濟加速發展。開發開放浦東，是大陸九〇年代改革開放的重點。浦東新區第一批十大城市基礎設施工程除外高橋電廠外，都已提前兩年完成。縱橫二十公里的七條主要幹道改建貫通，新區「七通一平」面積達到十一點八平方公里。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張江高科技園區、金橋出口加工區、外高橋保稅區等重點小區功能開發加快。一九九三年，新區實現國民生產總值一六四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三〇·二；進入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達九二

② 上海統計局，前引文，頁二三。

③ 上海統計（上海），一九九五年第一期，封底統計表。

④ 上海統計，一九九五年第三期，封底統計表。

四個，協議利用外資一七點二九億美元；新區內聯項目一七二七個，總投資一三五點九億元^⑤。一九九四年，浦東新區人民平均國民生產總值爲一九七二〇元，比上海市平均水平高四〇〇〇餘元，並首次超過了深圳、珠海等特區。一九九四年，浦東新區國民生產總值達二九一億元，這個數字是深圳的一半。然而，一九九三年浦東的國民生產總值僅爲深圳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浦東新區的開發速度已超過深圳而一躍成爲整個大陸所有特區及開發區之首^⑥。在浦東開發開放的「龍頭」帶動下，上海全市的外向型經濟發展跨上一個新台階。至一九九三年底，上海累計簽訂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六九三九個，協議利用外資金額一三七〇五億元。一九九三年上海外貿進出口商品總值達到一二七・一八億美元，其中出口商品總值達到七三・八二億美元^⑦。一九九四年又有進步，外貿進出口商品總值達到一五八・一九億美元，其中出口總額達到九〇・七七億美元^⑧。

正因爲具有上述有利條件，所以大陸當局才會如此躊躇滿志地提出到本世紀末下世紀初將上海建成國際一流大都市。中國大陸要更快地向世界，更好地吸引人類文明的成果，從而更快地發展，必須選擇連接大陸外市場的最佳結合部，顯然，讓上海充當這一角色相比較而言，是合適的。再說，上海曾經是計劃經濟影響最深的地區，倘若在這塊土地上率先步入世界先進行列，那麼將大大推進中國大陸的發展。目前，在中國大陸，無論是實業界、政界，還是理論界，都對這一宏偉目標抱樂觀態度，似乎達到這一目標是不用懷疑的。

三、不利因素

(一) 制約因素之一：社會制度的束縛

以上僅是分析了對實現將上海建成國際大都市的一些有利條件。但上海面臨更多的是不利的條件，存在著大量限制實現這一宏偉目標的制約因素。倘若這些制約因素不改變，在本世紀末下世紀初將上海建成國際大都市確實是勉爲其難的，甚至可能只是一場夢囈。

⑤ 上海統計局，前引文，頁二四。

⑥ 楊子晚報（南京），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第四版。

⑦ 同前引文。

⑧ 上海統計，一九九五年第一期，封底統計表。

這些制約因素首先來自制度方面，即是制度上的束縛。

百年來上海經濟變遷的過程可以看出，制度因素對上海發展的重要性。本世紀二〇年代至三〇年代上海曾是大陸及國際資本最佳投資場所。當時外國資本在中國大陸金融業的投資，上海占了百分之七九，進出口貿易占百分之八〇，不動產占百分之七〇，工業占百分之六七^⑨。上海這一優勢地位，與上海的社會經濟制度密切相關。近代上海租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個特殊產物，它的存在客觀上為近代上海提供了一種特別的制度條件。它客觀上使上海完全處於一種自由經濟的環境。世界各種主要勢力在上海處於一種「均勢」狀態。當時上海出現了多國投資、多國貿易、多國競爭的局面，這對上海形成國際化都市創造了條件。當然，這並不是對殖民地經濟的肯定，而只是想說明當時這種制度所形成的相對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對上海經濟發展具有正面的影響。但是五〇年代以後，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基本條件，以及作為大陸貿易、金融中心中的地位不斷喪失，這顯然是大陸經濟轉向中央集權型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

從上海的發展過程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看出，所謂制度的因素主要表現為以下兩方面：一是經濟的開放程度；二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方式和強度。如果開放度大，政府干預較少，且是間接的，那麼發展就快。歷史上的上海正是由於遠離政治中心（北京及南京）而成為經濟、貿易、金融中心。

另外必須提出，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在某種程度上，制度、體制是可以選擇的。然而，對於一個國家中的某個地區，幾乎不存在這種選擇空間。上海作為中國大陸的一個地區性城市，當然不可能具有對經濟體制基本框架的選擇權。對上海來說，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是外部給予的。所以，制度因素對上海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具有不可控性。

九〇年代以來，中共當局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即建立市場經濟，此為上海重新恢復並進一步建立經濟、貿易、金融中心功能與地位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前提。然而，如上所言，體制轉變是一個逐步的過程。在此轉變的過程中，原有的體制仍會在不同程度上產生影響。例如，對資金的計劃調控與對金融的劃塊分級管理仍將繼續發揮它的主導作用，這種管理體制會阻礙資本跨地區、跨行業的合理流動，從而就很難在地方上形成一個真正的金融活動中心。再如，在地方財政包乾的背景，地區經濟發展的動機被強化，對於擴大省際貿易和形成全國統一市場，在客觀上產生了負效應。目前大陸正在進行以分稅制為主的財政改革和外貿體制改革，這將有利於改善這種體制弊端，但是新的改革舉措真正產生作用需要經歷一個新舊體制的融合階段，地區性貿易壁壘在這期間仍會存在，這對上海成為「三個中心」的目標，將帶來嚴重障礙。

以開放的程度而言，目前確實看不到大陸有緊縮的跡象，這對上海的發展是有利的。但另外應看到，當大陸經濟重新走

⑨ 厲無畏等，「上海經濟發展的因素分析與趨勢判斷」，上海經濟，一九九四年第五期，頁六。

向開放時，它帶給上海經濟的影響是複雜的。一方面，它會使上海經濟重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提高它的出口依存度，強化它的國際轉口貿易功能。另一方面，由於大陸不同口岸間的激烈競爭，也會削弱大陸內轉口貿易的功能。

再以政府的干預程度而言，對上海的發展就大為不利了。實際上，目前大陸當局對經濟的干預有增無減。這種干預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生產力佈局政策。從五〇年代初至七〇年代末，大陸的基本建設投資經歷了一個大規模「西進」的時期，投資重心在內地。從八〇年代初以來，又經歷了一個「東回」時期，投資重心轉向沿海。然而，無論是「西進」還是「東回」，國家投資的主導性佈局傾向都是平衡投資，即基本以大區為單位，較為平均地將全部投資額分布在各個大區。在大區之內，則既有某種程度的平衡投資傾向，也有某種程度的配套投資傾向。在這種情況下，上海所獲得的國家投資，是較為有限的。這種以生產力佈局為主要內容的政府干預，產生了顯著而深遠的影響。首先，它使上海的經濟增長缺乏大規模投資的強烈支持，從而導致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其次，它使上海製造業失去了借助於投資活動而取得技術進步的機會，從而嚴重削弱了上海的技术領先地位。政府干預對上海經濟發展帶來的傷害還表現地方財政收入的轉移。上海地方財政收入持續多年大規模上繳，上海地方財政支出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一直處在很低的水平上，最低年份僅為百分之七·七^⑩。大陸的財政收入在八〇年代之前有六分之一來自上海，八〇年代以後雖然稍有改變，但仍有一十分之一來自上海。大規模的財政收入的轉移，在長時期內給中央財政提供了重要的財力支持，但上海經濟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九〇年代以後，大陸當局決定開發開放浦東，對上海的政策似乎有所寬鬆，對上海的投资開始增加，但所增加的投资比例，對上海大規模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仍然是不足的。基於某種政治考慮，特別是江澤民出身上海，中共高層很難給予上海特殊的「恩寵」，有時甚至要接受某種特殊的「政治壓抑」。

(二) 制約因素之二：國際環境的限制

上海想要在本世紀末、下世紀初趕上世界一流城市，成為國際化大都市，必須有超乎異常的跳躍式發展速度，這就需要超常規模的資金。這些資金從那裡來？顯然，僅靠中央政府「少提取多留成」是不夠的，這僅僅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關鍵在於，上海能否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獲取足夠的投資資金，這就涉及到上海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問題。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實行相對封閉的經濟政策，國際環境的影響相對處於次要地位，而國內的政治、經濟影響則顯得重要，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推進，作為處於改革開放前沿的上海，國際環境的影響就顯著提高了。

縱觀目前國際環境，對上海的經濟發展並不是非常有利。眾所周知，石油危機以後，西方工業化國家經濟進入了低速增

^⑩ 陳家海，「不可控因素與上海經濟發展」，上海經濟，一九九四年第六期，頁六一。

長的時期。隨著蘇聯、東歐的解體，東西方冷戰已讓位於美、日、歐的經濟競爭。歐洲一體化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形成，使全球性區域一體化的趨勢日漸明朗。目前，「區域一體化」已被認為是「在區域內實行自由貿易，對區外產品進入實行歧視」的貿易保護新形式。今天，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世界貿易空間日益狹小。面臨這樣一種國際背景的海，想依托國際資本來發展自身，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

美國提供的資金、技術和市場曾經對日本經濟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日本在亞洲已取代美國，扮演了資本、技術、貨物供應商的角色。亞洲四小龍通過出口導向戰略而實現的經濟增長，從初期利用廉價勞動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化為以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為主的出口者。而東協國家和包括上海在內的中國大陸目前仍主要依靠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和初級產品為主以獲取外匯。各種分析表明，上海在進出口產品結構、就業結構等指標方面仍處於「雁行結構」的尾部。八〇年代提出的「雁行結構」，仍適用於說明九〇年代東亞國家（或地區）的區域分工，即日本是領頭雁，新興工業國家（或地區）緊隨其後，接著是東協國家，上海即使算得上是一隻雁的話，那也處於其尾部。上海受到四小龍，特別是東協各國的競爭壓力，如何從國際分工中得到最大收益，同時又擺脫國際競爭的不利影響，乃是在今後相當時期內上海發展的重大難題。

上海受到國際環境的制約，說到底是受到外資分流的制約。由於財富的快速積聚，以及除中國大陸以外的東亞各國（地區）大多資源貧乏，地域狹小。因此，各國（地區）一方面鼓勵來自發達國家的投資，以獲取新的技術和設備，促進本國產業升級和出口產品的換代；另一方面則通過相互投資以獲取比較利益。至九〇年代初，在對東協五國的直接投資中，日本最多，亞洲四小龍的直接投資相當於日本的百分之六〇，超過美國百分之二〇^⑩。各國在東亞的投資出現分流格局，從而對上海進一步吸引外資帶來了十分不利的影響。在經濟發展和投資活動空前活躍的同時，區域間貿易比率直線上升，近年，亞洲四小龍之間的貿易增長了百分之三〇至百分之七〇^⑪。區域內投資和貿易活動頻繁，導致資金流動得以加強。隨著東京離岸金融市場建立、新加坡亞洲美元的誕生，以及香港當局對金融業的刻意塑造，東京、香港、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地位以及香港、新加坡的貿易中心地位已得到國際認可。在這種態勢下，上海要想擠進這一圈子確實是艱難的。

（三）制約因素之三：地理區位的掣肘

前面已指出，上海所處的地理位置對上海發展是非常有利的。確實，上海位於中國最大河流——長江的人海口，又正好處在太平洋西岸南北海岸線的中點，它的腹地是富饒的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流經上海的黃浦江具有優良的港灣條件，

^⑩ 石良平等，「上海實現戰略目標的難度極大」，上海經濟研究（上海），一九九四年第八期，頁六九。

^⑪ 同前引文。

這種有利的地理區位條件，賦予了上海開展貿易和發展經濟的巨大潛力。

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實際上，上海所處的地理區位還有使之發展受掣肘的一面。而且，後者的負面影響正呈上升趨勢。

雖然地理位置是不會變的，但相對的區位優勢仍可能因現代化交通的發展而發生變化。一方面以上海為樞紐的鐵路、公路網絡的建立，進一步加強了上海對腹地的引力，但另一方面原有優勢也有被削弱之處。其主要表現在：

1. 上海周圍港口的建設與發展，如寧波、北倫、深水港、張家港等，形成對上海的強烈競爭。
2. 京九線以及規劃中四川到北海港的鐵路與公路建成後，將提供長江上游地區出海的新選擇。
3. 三峽水庫的建設也許會削弱長江黃金水道的載運力。

自八〇年代中國大陸沿海對外開放以來，大陸東部沿海地區已初步形成了多元化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其主要開放區有：環渤海灣地區、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區。將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與其他兩區略作比較，就看出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已沒有多少優勢可言。

珠江三角洲的發展以及參與區域分工的模式已經明確。隨著八〇年代中期深圳等地區的發展，大量外部資金以直接投資的形式流入珠江三角洲。以香港為主的資金、標準化的技術與當地充裕的勞動力資源相結合，珠江三角洲經濟迅速崛起。珠江三角洲已成功地完成了以出口勞動密集型製成品為主的出口導向的第一階段。逐步向出口導向第二階段（以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的階段）過渡。隨著一九九七年的到來，臺灣和大陸經濟的發展，港、臺、大陸南部將可能形成「三位一體」的分工與發展格局。顯然，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就不具有這樣的有利條件。

儘管目前還不容易立即對渤海灣地區參與區域分工和發展的模式作出判斷，但是從這兩年日本、韓國資金大量進入這一地區來看，估計不久該地區很可能與日本、韓國之間建立更為密切的區域經濟合作關係、而且，日、韓在技術能力方面領先於港、臺，轉移的產業的層次也會高於港、臺，而渤海灣地區的主要城市原有的工業基礎也略高於珠江三角洲地區，所以渤海灣地區的發展具有強大的後勁。從這一點而言，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將比不上渤海灣地區。

從目前來看，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還沒有出現明顯的參與區域合作的模式。珠江三角洲地區其地理位置決定了與港、臺聯繫密切，可與港、臺建立較為密切的合作關係。而渤海灣地區在地理區位上則與日、韓相近，其與日、韓建立區域合作關係具有很大的可能性。也就是說，珠江三角洲地區可依托港、臺，渤海灣地區可依托日、韓，唯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沒有這樣的「得天獨厚」。所以，對上海地理區位的優勢必須重新審視。

四、比較與結論

通過上述三大制約因素的分析，難免使人對上海跨世紀發展戰略，產生質疑。爲了更清楚地認識到目前條件下，實現此一目標僅是一廂情願而已，在此作些比較分析。

東亞地區近三十年來已創造了三次經濟發展奇蹟：第一次是六〇年代日本的迅速崛起，其經濟以年平均百分之十速度增長了近十年，一躍成爲世界經濟強國；第二次是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一躍躋身於世界中等發達國家之列；第三次是八〇年代至九〇年代中國大陸和東協各國的經濟高速增长。在三次奇蹟中，逐步誕生了一批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的大城市。下面我們就看看上海與東亞其他大城市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按照目前各自的發展速度，上海需要多少年才能趕上它們：（以上海一九九一年每人平均GDP爲一一七四美元，一九九一年一美元等於五·四三元人民幣計算，今後上海每人平均GDP成長率百分之十爲比較基準）

上海與東京：東京一九九〇年每人平均GDP爲四七一七七美元，假定東京今後每人平均GDP以百分之三速度增長，那上海需要四九年才能趕上東京，假定東京仍爲百分之三，而上海爲百分之十五，那上海需要二九年方能與東京持平。

上海與新加坡：新加坡一九九一年每人平均GDP爲一五三三九美元，假定新加坡今後每人平均GDP以百分之五速度增長，那上海需要二八年方能與新加坡持平。

上海與香港：香港一九九一年每人平均GDP爲一四三七六美元，假定香港今後每人平均GDP以百分之五速度增長，那上海需要五四年才能趕上海香港，假定香港仍爲百分之五，而上海爲百分之十五，那上海需要二八年方能與香港持平。

上海與臺灣：臺灣一九九二年每人平均GDP爲一〇一九六美元，假定臺灣今後每人平均GDP以百分之五速度增長，那上海要四六年才能趕上臺灣，假定臺灣仍爲百分之五而上海爲百分之十五，那上海需要二四年才能與臺灣持平。

上海與韓國：韓國一九九一年每人平均GDP爲六三〇四美元，假定韓國今後每人平均GDP以百分之五速度增長，那上海需要三四年才能趕韓國，假定韓國仍爲百分之五，而上海爲百分之十五，那上海需要十九年才能與韓國持平。

上海與曼谷：曼谷一九九一年每人平均GDP爲四九九二美元，假定曼谷今後每人平均GDP以百分之六速度增長，那上海需要三九年才能趕上曼谷，假定曼谷仍爲百分之六，而上海爲百分之十五，那上海需要十八年才能與曼谷持平^⑬。

⑬ 同前引文，頁六八。

從這一比較中可以看出，上海處於相對落後狀態。即使把上海的每人平均增長率定為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五，上海要趕上東亞其他大城市也是很遙遠的事。這就是現實。

前述這一比較或許還較為籠統。另外有一份大陸學者提供的關於一九九二年上海與一九九一年新加坡的各項指標的詳情比較，從中可以更具體地看出上海之落後：

1. 一些主要總量經濟指標之比較

上海國民生產總值一〇六五·九四億元，折合美元計算，比新加坡的四〇八·九九億美元，低百分之五四·七；上海外貿進出口總額二五一·四五億美元（海關），比新加坡的二二五·一億美元少九九九·四五億美元，低了百分之七九·九。

2. 產業結構之比較

上海產業第一、第二產業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分別高於新加坡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二七·七，第三產業比重則低於百分之三六·七，其中金融業和商業新加坡分別占百分之二七·六和百分之二六·七，而上海則不到百分之十。上海就業人口中，從事第一、第二產業的人數比重分別比新加坡高百分之九·七和百分之二四·九，而從事第三產業的人數比重則比新加坡低百分之三四·六。

3. 經濟外向度之比較

上海外貿進出口總額（海關）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比新加坡低百分之二一·九；

上海外貿出口總額（海關）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比新加坡低百分之一〇二·五；

上海本地產品出口總額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比新加坡低百分之七二·六。

4. 固定資產投資率之比較

八〇年代，新加坡的投資率有六年在百分之四十以上，最高年份達百分之四七·二，其餘各年平均在百分之三三以上，上海八〇年代的投資率均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上海一九九二年國民生產總值中固定資產積累所占比例，比新加坡一九九一年國民生產總值中固定資產積累所占比例少百分之九·一。

5. 居民消費結構之比較

恩格爾係數（食品支出占總支出比例）上海遠高於新加坡百分之三三·二，上海居民支出中一半以上用於吃的支出，而新加坡用於食品支出僅占五分之一強；

醫療保健和居住、公用事業支出上海較新加坡低，所占比重分別低百分之三·九和百分之五·三；交通郵電支出上海所占

比重較新加坡低百分之十五·二；娛樂、教育、文化支出上海較新加坡低百分之十一^⑭。

通過上述與新加坡的具體比較，可以較具體而清晰地看到上海與新加坡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差距。上海目前習慣於以新加坡作為建設成國際大都市的目標模式，主觀願望可嘉，但可惜離實際太遠。在本世紀末、下世紀初將上海建成國際大都市是一個好夢，但同時又是個難圓的夢。

*

*

*

⑭ 陳步林，「上海成爲國際化大都市的基礎與不足——兼與新加坡的比較」，上海統計，一九九三年第六期，頁一〇二—一〇七。